

反讽的伦理维度：克劳德·罗森的斯威夫特研究及其启示

The Ethical Dimension of Irony: Claude Rawson's Swift Study and Its Implications

苏 晖 (Su Hui) 边文君 (Bian Wenjun)

内容摘要：克劳德·罗森教授对斯威夫特进行了长达 40 多年持续深入的研究，并就其著名政论文《一个温和的建议》做出了颠覆性的解读。他认为斯威夫特时常借反讽手法的语言保护性隔离作用，营造出一种以不确定性为特征的文体风格，不断扩大讽喻范围，使文章的伦理意义趋向模糊与含混，并且他还发现斯威夫特对背德行为的残酷想象与纳粹的暴虐行径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尽管这种反讽伦理指向的不确定性还是被一个终极的道德框架所束缚，从而保有确定性，罗森依然提醒我们对反讽与伦理之关系的重视。罗森将伦理道德的视角纳入对经典作品的解读中，肩负起了文学批评家的社会责任。打破伦理边界的反讽会对人类生活造成极大的威胁，但反讽本身具有伦理价值。因此，为了能够合理地利用反讽，文学批评在阐释的过程中就需要充分发挥作用，这也为文学伦理批评的构建带来了新的启示。

关键词：克劳德·罗森；斯威夫特；《一个温和的建议》；反讽；伦理

作者简介：苏晖，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国际文学伦理学批评研究中心主任，主要从事欧美文学、文学伦理学批评、戏剧美学研究；边文君，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生，主要从事文学伦理学批评、英美文学研究。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理论资源与对外传播研究”【项目批号：21&ZD264】的阶段性成果。

Title: The Ethical Dimension of Irony: Claude Rawson's Swift Study and Its Implications

Abstract: In sustained and in-depth studies of Swift spanning more than 40 years, Claude Rawson offers a subversive interpretation of his famous political essay, *A Modest Proposal*. He argues that Swift has at times drawn on the protective insulation provided by irony to create a style featuring uncertainties, constantly expanding the scope of satire and leading to a tendency toward ambiguities of the essay's ethical significance, and he also finds striking parallels between Swift's imagination of immoral acts in disconcerting detail and Nazi's tyrannies.

Although the uncertainties are confined by an ultimate moral framework and thus certainties remain, Rawson still reminds us to attach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rony and ethics. By incorporating an ethical perspective into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is literary classic, Rawson takes the social responsibility of a literary critic. Irony that breaks the ethical boundaries poses a great threat to human life, but irony itself has ethical value. Therefore, in order to take advantage of irony, literary criticism needs to play a full part in the process of interpreting it, which also brings a whole new level of insight to the construction of literary ethical criticism.

Keywords: Claude Rawson; Jonathan Swift; *A Modest Proposal*; irony; ethics

Authors: **Su Hui** is Professor at the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9, China) and the director of the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specializing in European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and the aesthetics of drama (Email: suhuichina@163.com). **Bian Wenjun** is a Ph.D. candidate at the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9, China), specializing in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and English literature (Email: bianwenjun@mails.cnu.edu.cn).

反讽通常指语言文字表面含义与实际含义的冲突或相反，包含同时并存的两个对立物的结构。在文学上，反讽既指语言的修辞技巧，也指隐含在人物、情节或主题中与正面描述意义相悖的暗示或对照技巧、组织结构方法。斯威夫特在其著名的政论文《一个温和的建议》（“A Modest Proposal”，1729）中就运用了精湛的反讽手法。该文全称为“防止爱尔兰贫家子女成为父母和国家的负担，并使他们对公众有益的一个温和的建议”（“A Modest Proposal for Preventing the Children of Poor People in Ireland from Being a Burthen to their Parents, or Country; and for Making them Beneficial to the Publick”），以英国统治下爱尔兰民不聊生的境况为背景，借一位献策者的“温和”口吻，提出了一个看似公正可行实则异常可怖的建议：母亲将婴儿喂养到一岁时，卖给达官贵人食用，此时是炖、烤、焙、煮俱佳的美食。该文通常被解读为对英国在爱尔兰殖民统治的讽刺，以及对爱尔兰当地地主贪婪和掌权者无能的嘲讽，另外一种解读认为斯威夫特在讨论当时的经济政策或经济学理论。

克劳德·罗森（Claude Rawson）对斯威夫特的研究长达40多年，关于《一个温和的建议》的讨论散见于他不同阶段的代表作中，包括《格列佛与温雅的阅读者》（*Gulliver and the Gentle Reader*, 1972）、《从混乱中显现的秩序》（*Order from Confusion Sprung*, 1985）、《上帝、格列佛与种族灭绝：野蛮与欧洲想象：1492-1945》（*God, Gulliver and the Genocide: Barbarism and*

the European Imagination, 1492-1945, 2001)、《斯威夫特的愤怒》(*Swift's Angers*, 2014)等。与学界一般的解读不同,罗森认为《一个温和的建议》更多是作者在盛怒之下流露出对爱尔兰人的诋毁,暗示了传说中爱尔兰人有食人的残酷习性。他从伦理的视角出发去解读斯威夫特的反讽技巧,阐释了他在残酷想象与道德教诲之间不断游移的独特写作风格,并结合二战纳粹的暴行从这一经典文本中得到了全新、具有启发性的结论。本文将分别论述罗森关于《一个温和的建议》中的自由想象和作品伦理意义的探讨,并进一步分析反讽与伦理的关系及其对文学伦理批评构建的影响与启示。

一、罗森论斯威夫特作品中反讽伦理指向的不确定性

诺思洛普·弗莱(Northrop Frye)在对比讽刺和反讽时指出,“讽刺是激烈的反讽,其道德标准相对而言是明确的(……)当读者肯定不了作者的态度为何时,或读者自己的态度应该如何时,就是讽刺成分甚少的反讽了”(277)。也就是说,与讽刺相比,反讽的伦理意义更加不确定、更加模糊,以至于读者产生模棱两可之感。在罗森的研究中,《一个温和的建议》就是这样一部反讽之作,斯威夫特试图冲破“吃人是非人道的”这一道德框架,而读者能从语言中屡次感受到作者非理性的狂怒之情及其所释放出的人性之恶的本能。罗森认为,斯威夫特的讽刺中产生的令人不适的情感(embarrassment)十分激进,“是对改善和颠覆一种风格的应有反应,而这种风格的整体本质就是破坏确定性,包括它有意识宣称的确定性”(Rawson, *Gulliver and the Gentle Reader* 40)。从文体风格上看,其“不确定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两点:

第一,在文本中,斯威夫特经常将讽刺扩展到看似不相关的对象上。按照反讽逻辑推理,在讽刺吃人行径的中心主题下,文章意在反对和痛斥这种暴力。表面看来的确如此,但斯威夫特有时会脱离这一路径,话锋一转,突然对潜在的受害群体进行重新定向的道德指控。比如,献策者说,自己的一位朋友反对以十四岁少女的肉补充贵族阶层所喜食鹿肉的匮乏,因为这些女孩即将可为国家繁育,但他接着又说:“我们都城里有不少胖姑娘,自己一个钱也没有,可是一出门就得坐轿子,穿着并非自己挣钱买来的进口华丽衣裳,在剧院和交际场所进进出出;要是把她们也照那样利用一下子(指将其割肉卖给贵族),对于国家大概不会有什么损失”(53)¹。斯威夫特这里针对妓女或愚蠢的女孩,意在暗示她们喜穿外国华服的虚荣心正在削弱爱尔兰的经济。然而,这种突如其来的新一重道德指控已经脱离了讽刺吃人行为的中心主题,即便是在全篇反讽语境的保护性隔离作用之下,这些文字也表现出对女性群体极大的攻击性和恶意。过剩的敌意“将讽刺的简洁逻辑混入更

1 原文的中译文均出自“育婴刍议”,《英国经典散文选》,刘炳善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20年,第40-63页。后文此类情况均只标注页码。

为模糊、更加难以预测的精确度中，将不安扩散到无法用理性解释的情感领域，并使读者也难以摆脱”（Rawson, *Gulliver and the Gentle Reader* 36）。

第二，献策者自相矛盾的两种口吻不断交错、切换，贯穿整篇文章，使作品在语气和口吻上呈现出一种不确定性。在通常情况下，自称人道的非人道宣传并不会使用野蛮、粗暴的非人道语言，而是会选择以冷静、善意的语气进行掩饰。然而，献策者却不时在话语间夹杂一些极端暴力的字眼。比如，文章伊始，在还未表现出这种风格的潜在恶意时，献策者说到“一个刚刚落地的婴儿”（a child just dropt from its dam），仅看中文并不能感受到该语言的冲击力，那么如果了解到“dam”此处为“母兽；尤指母马”的意思后，一种恳切的恶意似乎瞬间就以爆炸性的方式蔓延开来。除此之外，还有多处与其相似的把爱尔兰人兽化的用语，如用 breeders（意为“饲养者”）形容能生养的父母，用 carcass（意为“动物尸体；尤指供食用的畜体”）形容供贵族消费的儿童尸体等。这些措辞与说话者的性格和身份设定极其不符，从而使作品在整体目的与实际用语之间形成一种极不稳定的张力和矛盾。在罗森看来，这也正是斯威夫特所刻意经营的以不确定性为基本特征的文体风格，这些粗暴之语“打破了一个冷静、善意地鼓吹可怕行为的公式，而这种风格既包括这一公式，也致力于打破它们”（Rawson, *Gulliver and the Gentle Reader* 40-41）。

根据文体风格上的不确定性，罗森进而认为，本文实际上是对爱尔兰人的愤怒攻击，攻击对象不仅包括穷人，并且还将讽喻扩展到爱尔兰各个阶层。斯威夫特借用了古老的传说，这一传说表明爱尔兰人是塞西亚人的后裔，有吃人的习惯。文中所使用的诸如“母兽”“饲养者”“动物尸体”等词汇都能体现出他认为爱尔兰人是畜生，是传说中的动物，他们的行为使自己退化到了原始的野蛮状态。同时，文章“其他权宜之计”一段尤为明显地表现出爱尔兰陷入这般经济和社会惨况的原因，包括地主的剥削、商人的欺骗与勒索、妇女们的骄奢淫逸之风、人民的不爱国、对外国商品的青睐等。这共同导致了整个国家的赤贫和窘境，而乞丐和穷人的问题也正是这些根本问题的表征之一。前文提及的偏离讽刺中心的突然攻击其实就是为了将讽喻扩大化，通过语言上的暴力释放，“痛斥他们（爱尔兰人）对维护自身利益的无能，以及他们在商业和经济领域对英国人的屈从”（Rawson, *Swift's Angers* 16）。文章最后提到英国人也不会拒绝吃人的建议，乐意“不要盐也可以高高兴兴吃掉我们的整个民族”（61），这则是更进一步地扩大化了讽喻对象，不仅有本国的穷人和富人，还囊括了帝国权力与殖民主体。

法国超现实主义布勒东（André Breton）在1939年编纂的《黑色幽默选集》中，首次提出黑色幽默的概念，并将斯威夫特称为黑色幽默的创始人，《一个温和的建议》收录于选集的第二篇，紧接着的第二位作家则是萨德。罗森赞同布勒东对斯威夫特的理解，认为他有远离讽刺和道德教化

的倾向，“斯威夫特的想象有趣地被暴力和难于言喻的东西所吸引，并趋于超越所有显性的对残忍的讽刺和对暴力的谴责而进入这一领域。有些作家会认为想象力无禁区，对此他或许不愿苟同；但是他的想象却包含了 he 想要禁止的很多东西”（罗森 9）。在《一个温和的建议》中，斯威夫特多次通过自由想象描述骇人听闻的内容，其中之一便是建议那些想要更为节俭的父母可将婴儿的皮剥下制成精致的女士手套和男士凉靴，供贵妇人和绅士们使用，尽管他用括号的方式申明这一策略实为当前局势所迫。巧合的是，在紧随其后所收录的萨德《朱丽叶的故事》中，相似的内容再次出现。故事的主人公明斯基是一个生活在亚平宁深山城堡中的食人魔，在他哥特式的房间中放着用人的骨架和头骨制成的椅子，城堡其他地方均用女性活人的身体做装饰，她们的身体扭曲成艺术造型用作桌椅。罗森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相似性，他提到：“斯威夫特没有像萨德那样精心塑造和刻画食人魔，但萨德很可能从斯威夫特那里获得了一些灵感，根据波伏瓦的说法，萨德‘使用甚至抄袭’了斯威夫特”（Rawson, *Gulliver and the Gentle Reader* 158-159）。在罗森看来，斯威夫特和萨德都在想象的空间享受着自由，但前者以残忍、背德的内容来展现作为理智的社会思想家被本民族自我毁灭的行为逼迫得近乎疯狂的状态，并借以讽刺爱尔兰的政治经济困境；而后者则远离了善与恶的羁绊，真正符合布勒东对黑色幽默的定义，不受道德的干扰。

令人不安的是，二战时期纳粹诸多惨绝人寰的恶行与斯威夫特和萨德的想象性描述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希特勒教子小马丁·鲍曼曾在自传中多次提到在他 14 岁时参观纳粹高官希姆莱阁楼的经历。在那里，他看到由人的躯体包括髌骨、腿和脚所制作的桌子和椅子，以及由集中营犯人背部的皮做封面的书。萨德和斯威夫特与纳粹的区别在于，前两位作家只是发挥了自由想象，并没有将其付诸真实行动，而纳粹却真正实施了文学想象中所描述的种种暴行，以至于当惨剧真切发生后，人们一时无法分清这是现实还是虚幻。对背德行为的想象与恶行的连续性不禁让人在两者之间构建一种确切的因果关系。纳粹的行径究竟是受到文学想象的启发，还是人类的恶具有普遍相通性，则是一直被提及而又无法回答的问题。罗森认为，文学的恶之言说“显示出对暴力压迫的心理结构的洞察，因为这些心理结构一方面栖息在探索性和创造性的想象中，另一方面则可引发行动领域的杀人暴行”（Rawson, *Swift's Angers* 128）。

罗森指出，斯威夫特“没有远离教化或讽喻的意图，但却超越了教化或讽喻。讽喻原则的倾向是明显反对任何纳粹式的行为，虽然在对待爱尔兰同胞的问题上，我们发现他还残留了一点‘他们活该’的意味”（罗森 165）。斯威夫特试图以反讽的方式通过阐释邪恶、背德的内容来达到讽刺效果和教化作用，以期改变爱尔兰的境况，然而他的语言并不只是蕴藏深层语码的含义，邪恶的表层语码也在说出口的同时传达出了其原本的意思。也就

是说，反讽所制造的字面含义和深层含义的对立会产生意义的模糊与含混，而在这种模糊与含混中，自由想象所带来的表层背德意义可能会在不经意间导致现实中恶性事件的发生。

二、罗森论斯威夫特作品中反讽伦理指向“不确定”中的“确定”

尽管斯威夫特看起来似乎快被现实和理想的巨大差距逼得失去理智，但这种倾向依然有意识地在被全文的道德框架所抑制。总体看来，作者还是在用理性驾驭和控制自己的笔触。

《一个温和的建议》反讽的伦理意义之确定性始终建立于斯威夫特对献策者提议的背景说明与设定之上。在罗森看来，文章设置了两组讽刺公式，即到底是一个正义的讽刺者被糟透的世界逼疯了，还是一个鼓吹吃人行径的恶人在正义的标准下被视作精神失常。在这两组相互平行的可能性中，均包含着—对矛盾的共存，而这也是斯威夫特为讽刺所搭建的公式。一方面，讽刺者正义的疯狂凝结为整个世界层面邪恶的疯狂。正如帕特里克·奥尼尔（Patrick O'Neill）写道：“只有当现实与理想之间的差距开始被认为是极端的，当幽默开始自觉意识到自己调和对立面的姿态是徒劳无益的，黑色幽默才会完全出现”（48），斯威夫特靠近黑色幽默的倾向的确也是迫于对现实的束手无策，就像文中献策者（也是斯威夫特本人）所说，“多年以来虽然提过不少空洞、迂阔，不切实际的意见，但是毫无成功之望，早已心灰意冷”（61），他之前所提出的道德、正义、理性的建议全都被这个无理的世界所忽视，被逼无奈之下，万念俱灰的改革者才义无反顾地疏远他曾经试图修补的“理智”世界，走向了提出极端吃人建议的非理性、反社会的道路。另一方面，虽然献策者恶语相向，口出骇人之语，字里行间透露出精明算计和清醒理智，这些都无端增强了修辞营造疯狂的力量，让闻者对其正义性产生深深怀疑，但在此背后依然有一个坚固的框架牢牢束缚着这股即将脱缰之力。当疯狂的言辞溢出第一个公式的框架后，它其实也就蔓延到了第二个公式：这个世界如此糟糕，以至于一个人能以最平静的方式宣扬吃人，这也就为献策者所有的疯狂言论提供了终极确定性，即“纵然存在所有可能的怀疑，吃人的行径也是不可取的”（Rawson, *Gulliver and the Gentle Reader* 144）。在正常标准下，吃人行为总是被视作邪恶、背德的，“吃人”的主题因此也就可以被随意、超脱地使用。

罗森还将斯威夫特与萨德及一些现代作家如安托南·阿尔托（Antonin Artaud）和让·热内（Jean Genet）等进行了比较。他认为，在后者的作品中，对“被禁止”行为的想象不再说明这些行为本身是错误的，吃人肉成为宣扬一个人“整体生命力”，宣扬个性、种族或政治真实性的有效方式。当阿尔托说残酷戏剧必须在某种意义上展现出观众的犯罪参与感、表现出戏剧的情欲驱动力及野蛮性甚至同类相食的行为时，他并不是希望观众真正去实施犯罪或食

人行为。但阿尔托也坚持认为,这些强烈的冲动不仅只存在于想象和虚幻中,而是具有内在性和本质性。对斯威夫特来说,文学的疗愈作用在于对人类埋藏的破坏性本能施加道德约束,吃人的极端行为被转化为一种讽刺公式,用来寓言和鞭挞恶毒的不道德行为。而对阿尔托来说,文学则是一种宣泄的途径,艺术家通过对极端行为的描述来极力释放人类潜藏的原始本能。¹

斯威夫特曾写到,讽刺的目的之一便是“一种公益精神,它促使杰出人物尽其所能地去修补这个世界的缺陷”(qtd. in Pollard 73)。他的作品因而也就带有浓烈的社会伦理色彩,而非堕入纯粹的审美维度。在他生活的17、18世纪,距纳粹大屠杀还有两百多年之久,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惨剧之一还未发生,那些背德的事项要么存在于远古的传说之中,要么存在于文学想象之中,即便有成规模的屠杀、食人等行为,其影响也不够轰动,不够具有震慑全人类的力量。在此时,一切看似与真实世界相去甚远,理性和伦理标准还未遭到质疑与破坏,所以他能够自由地基于背德想象去写作、去讽刺。然而,冥冥之中斯威夫特好像预感到了什么,他深知人类有做出极恶道德判断的冲动,并将这种冲动在作品中展现了出来,仿佛在提醒着人们对恶的提防与控制。

三、启示:对反讽与伦理之关系的辩证思考

即便如此,罗森提醒我们,“无论如何‘反讽’,总有在‘说着当真’、‘说说而已’和‘不只是说说’之间的互动”(罗森 145)。他在解读斯威夫特时,肩负起了批评家的社会责任,将伦理道德的视角纳入对经典作品的批评中,从伦理与美学关系的角度出发,得到了全新的、极具启发和意义重大的结论。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在评论罗森专著《上帝、格列佛与种族灭绝》时认为,他的解读有时暗示了他的极端保守主义倾向(reactionary tendencies)。伊格尔顿的说法固然有些夸张,因为这种“保守主义”倾向可能正是我们这个时代不可或缺的品质。二战的残酷教训看似与文学遥不可及,但从历史的后见来看,那些悲剧是否早已在一位又一位伟大的作家笔下潜藏着线索。如果我们依然以绝对审美的姿态书写和解读文学,那么将来是否会有惨烈百倍千倍的厄运降临在此处或彼处。“批评家的责任是由文学创作的伦理价值决定的(……)社会赋予文学批评家的责任,以便文学的价值标准能够得到坚守”(聂珍钊,“谈文学的伦理价值和教诲功能”15)。作为文学研究者,唯有肩负起这一使命,才能使文学发挥其真正的作用,为维护社会的伦理秩序与道德规范,为世界和人类的繁荣发展,提供正确指导。

反讽的确会给人类的道德生活带来挑战,尤其是在文艺史中伦理批评缺位的情况下。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德国浪漫主义文论拓展了反讽的概念,同

¹ 参见 Claude Rawson, *Gulliver and the Gentle Reader: Studies in Swift and our Time*. London: Humanities Press International, 1991, 145.

时也将反讽引向了远离伦理道德的纯美学境界。浪漫主义反讽的特点在于，从反面对自我界定的无止境超越，将一切事物视作自我的主观性的产品。绝对主体性的泛滥是浪漫主义反讽被诟病的主要原因。黑格尔在《美学》中对其进行批判。他指出，浪漫主义反讽艺术家不仅仅满足于把自己的生活和个性通过艺术形象表现出来，还凭借想象创造外在的艺术品。即便是客观的艺术形象也表现出绝对主体性的原则，“这就是说，不仅是对法律、道德、真理都不持严肃的态度，而且就连最高尚最优美的品质也都是空幻的”（84）。克尔凯郭尔也评价道：“（浪漫主义反讽者）过于抽象地生活着，过于形而上学地、过于美学地生活着，以致无暇顾及道德与伦理的具体境况”（246）。他们不愿接受任何现实性的内容，活在虚幻的想象中，以至于陷入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而罔顾现实伦理的纯美学想象则一不小心就会造成颠覆现实的破坏性力量，正如罗森指出，布勒东在斯威夫特和萨德作品中所发现的暴力的“美学”维度，与法西斯有着令人不安的历史联系，而后者有时也被称为“对政治的审美处理”（罗森 144）。

值得注意的是，在文学中使用反讽并不会直接挑战伦理道德，反讽本身具有伦理价值，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从哲学层面来看，反讽有助于人们与现实保持批判性的距离，推动伦理道德规则的变革和进步，促进伦理道德新观念的产生。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表明“人类的伦理道德规范也应随着科技发展、社会进步而改变。人们的伦理观念不是一成不变的抽象概念，而是随着历史发展不断得到提升和走向完善的”（苏晖 48）。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保持对当前现实与当前伦理道德规范有效性的反思和批判能力，是人类道德生活的前提，而反讽正是激活这种能力的有效手段。克尔凯郭尔认为，反讽主义者能够看到当前时代的局限性，发现既存现实的不完善之处。他指出，“反讽者逃离了同时代的队伍，并与之作对。将来的事物对他来说隐而不现，藏在他的背后，而对于他所严阵以待的现实，他却非摧毁不可，他以锋利的目光逼视着这个现实”（225）。同时，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将反讽主义者定义为“认真严肃地面对他或她自己最核心信念与欲望的偶然性”的人，他们“不再相信那些核心的信念与欲望的背后，还有一个超越时间与机缘的基础”（6）。从该定义中也能发现，在罗蒂看来，反讽是一种与当下的现实与承诺保持怀疑距离的能力。两位反讽理论家均从主体与现实关系的角度，指出反讽对于既定现实的质疑能力，这一能力为伦理规则的更新和完善开启了新的可能性。

其次，从文学的角度来看，反讽伦理意义确定性的“缺失”会避免道德判断的简单化倾向，通过训练读者的道德判断力，反讽可以增强读者的道德理解力。文学作品能够帮助人们加深对已习得的抽象道德原则和道德概念的理解。当代美国分析美学家诺埃尔·卡罗尔（Noël Carroll）将理解与知识区别开来：“理解是掌控并恰当运用已知概念和命题知识的能力，是完善知识

的活动，是认识到知识储备的各个部分之间联系的活动，是通过实践和判断的过程使知识变得清晰的活动”（143-144）。而文学作品要求读者参与到对人物、情境甚至作品的整体观点进行道德判断的过程，也正是通过道德判断的训练，人们才能真正掌握这些抽象概念与原则。在反讽的文本中，矛盾与悖谬的并置会增强道德判断的难度，阻碍读者做出直接判断，延长其做出判断的时间。在这种复杂的情境中，读者不得不仔细阅读文本的细枝末节，并结合自己的道德知识反复推敲、揣摩，这能够迫使他们不断去质询和反思，从而加深对道德的理解。同时，反讽也能避免作者直接说教的道德传达方式。如果文学作品直截了当地表述一些道德规范和道德戒律，不仅会使作品枯燥乏味，还会使其可信度遭到质疑。斯威夫特的讽刺和反讽作品也几乎完全没有直白的道德箴言、警示告诫等，他“拒绝提供任何总括性的文本权威，因为这会阻止作品所要启动的道德辨别”（Suarez 116）。

再次，反讽的双面特征可以帮助读者从反面认识道德，为认识提供更加全面的维度。新修辞学代表人物肯尼斯·伯克（Kenneth Burke）关注反讽在“发现和描述‘真理’中的作用”（503），并指出反讽包含辩证思维。他认为，作为修辞手法的反讽不仅能够帮助人们在认识论上发现真理，反讽在本体论上也是真理的一种构建方式。对事物的完整认识包含着全面观照相互对立、相互矛盾的各种要素，反讽则能够完美地平衡这些不同要素。与这种辩证思维相似的是，当代英国美学家马修·基兰（Matthew Kieran）在文艺伦理价值与审美价值关系的论争中提出“认知的背德主义”（cognitive immoralism）一说，他认为，“想要充分领会和理解某种经验的本质，我们需要比较项。这就是说在某种意义上我们需要先体验‘恶’才能理解‘善’”（63）。而反讽所具备的表面意义与实际意义的对照，恰好为读者对道德的全面理解提供了极佳的语境。在反讽的语言保护作用中，通过表层背德事项的描述，人们可以探索在现实中由于道德禁忌而尽量避免的态度和反应。阅读那些有意展示欲望和“恶”的文学作品，人们能够了解如何应对现实生活中的许多背德欲念，同时加深对道德和善的理解。就如罗森所指出的那样，斯威夫特“所痛斥的暴力与他语言风格中充斥的暴力如出一辙，正如在《一个温和的建议》和其他作品中，他所讽刺的他人的谋杀计划与他自己的攻击倾向并行不悖，就像他用疑似反讽的语气希望将那些穿外国服饰的爱尔兰女孩纳入食人计划一样”（Rawson, *Gulliver and the Gentle Reader* 57）。在斯威夫特的作品中，读者透过反讽深切体会到作者在道德与背德之间的不断犹疑，在善与恶之间的反复纠结，看到人类即便是伟大的人类也会轻易地被恶所引诱。这是大众在被种种道德规范制约的现实中不曾也不会认真考虑的内容，在作品中直面这种恶可以加深对现实中善的领悟。

反讽作为一把双刃剑，既会对伦理道德造成威胁，又能够促成积极的伦理效果。因而，为了能够合理地利用反讽，文学批评在阐释反讽的过程中就

需要充分发挥作用，以消除反讽潜在的伦理危害。

韦恩·布斯（Wayne Booth）在《反讽修辞学》（*A Rhetoric of Irony*, 1974）中提出“稳定反讽”的概念，强调作者意图在阐释中的重要性。他认为稳定的反讽具有四个特征，即“意图性”“隐蔽性”“稳定性和固定性”和“在应用中的有限性”（5-6）。而读者普遍读不出反讽含义的反讽即为“不稳定反讽”。他对比笛福《消灭不同教派的捷径》和斯威夫特《一个温和的建议》，以此阐释反讽由于缺乏明确的意图线索所导致的弊病。笛福的小册子以保守党托利党人的口吻号召清除信奉国教者，但读完全文，读者并不会有所怀疑，不会想象到文章实际上是出自一位辉格党人之手。斯威夫特则不同，他会陈述一项积极的计划，用以“揭示作者的立场”（Booth, *A Rhetoric of Fiction* 319），比如他在文末用颇多的笔墨描述真正可以改良爱尔兰社会的“权宜之计”。由此，布斯指出，虽然笛福保持了现实主义的统一性，让全文口吻一致，手法似乎更高明，但对于反讽来说，“斯威夫特的作品则更胜一筹，因为它愿意牺牲连贯性而去追求讽刺的力量”（320）。

然而，布斯的反讽理论却受到众多后现代主义者的攻击，他们不认为文本意义具有确定性，因为每个人的评判标准都具有或然性。读者反应批评的代表人物斯坦利·费什（Stanley Fish）反对布斯将反讽与字面意义紧密联系而建立起的稳定反讽。他指出，字面意义和反讽意义都是阐释的产物，一种阐释无法涵盖文本的所有方面，“对反讽的阐释建立在假设和信念的结构之上，所以会受到挑战或修正”（190），但也因而有了一种连续解释的确定性，在这其中，一种解释总会让位于另一种解释。著名反讽理论家琳达·哈琴（Linda Hutcheon）认为，仅对说话者意图进行单方面阐释是不够的，“意向性和能动性也同样被包含在阐释者的活动中”（12），接受者也会积极参与到反讽意义生成的过程中，并且反讽发生在“话语”中，“所以在考虑其语义和句法层面时，就不能脱离反讽所应用和归属语境的各种社会的、历史的以及文化的方面”（17）。也就是说，在对反讽的阐释中，既然阐释者因所处社会、文化、历史或个人境遇等环境的不同，对文本有不同的理解，文本意义具有不确定性，那么对后现代主义者来说，作品的伦理道德意义自然也就是不确定的，人们无法从中获取任何确切的道德知识，因为道德标准因人而异，并不存在客观和普遍的伦理道德真理。这样就会陷入道德相对主义，而道德相对主义则极有可能引发各种现实层面的问题，甚至走向道德虚无主义。可见，后现代主义反讽试图克服阐释的单一化和绝对化，试图将更多内容纳入到反讽的文学阐释中，但与此同时，却似乎又再度堕入浪漫主义反讽的危机，陷入意义的不确定性和价值相对主义，正如后现代主义之父伊哈布·哈桑（Ihab Hassan）所言：“（后现代）反讽变成激进的自我消耗的游戏、意义的熵”（104）。

面对这一难以调和的困局，我们可以转向由中国学者提出并构建的文学伦理学批评寻找一种可行的解决之道。文学伦理学批评认为，“不同历史

时期的文学有其固定的属于特定历史时期的伦理环境和伦理语境，对文学的理解必须让文学回归属于它的伦理环境和伦理语境，这是理解文学的一个前提”（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14）。该批评方法要求在特定的伦理环境中分析文学作品，这样就能避免因伦理环境与语境不同而造成解读的主观性与差异性，因而在对反讽的解读中，既能克服布斯式仅对作者意图的关注，也能在解决后现代道德相对主义问题的同时将客观的社会历史语境纳入考虑。此外，文学伦理学批评认为伦理价值是文学最根本的价值，审美价值只是伦理价值的一种体现；审美具有伦理性和功利性，只是实现文学作品伦理价值和教诲功能的途径与手段。因此，绝不必担心文学伦理学批评会让反讽陷入伦理意义不确定的迷雾中，也不会出现反讽被纯美学想象所控制的情况。在捍卫文学伦理价值的方面，文学伦理学批评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和前景。

Works Cited

- Booth, Wayne C. *A Rhetoric of Fiction* 2nd ed. Chicago and London: U of Chicago P, 1983.
- . *A Rhetoric of Irony*. Chicago and London: U of Chicago P, 1974.
- Burke, Kenneth. *A Grammar of Motives*. Berkeley: U of California P, 1969.
- Carroll, Noël. "Art, Narrative, and Moral Understanding." *Aesthetics and Ethics: Essays at the Intersection*, edited by J. Levinson, Cambridge: Cambridge UP, 1998. 126-160.
- Eagleton, Terry. "A Spot of Firm Government." Review of *God, Gulliver, and Genocide*, *London Review of Books* 23 Aug. 2001: 19-20.
- Fish, Stanley. "Short People Got No Reason to Live: Reading Irony." *Daedalus* 1 (1983): 175-191.
- 弗莱：《批评的剖析》，陈慧等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年。
- [Frye, Northrop. *Anatomy of Criticism: Four Essays*, translated by Chen Hui, et al. Tianjin: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1998.]
- 伊哈布·哈桑：《后现代转向：后现代理论与文化论文集》，刘象愚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
- [Hassan, Ihab. *The Postmodern Turn: Essays in Postmodern Theory and Culture*, translated by Liu Xiangyu.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15.]
- 黑格尔：《美学》第1卷，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
- [Hegel. *Aesthetics* vol. 1, translated by Zhu Guangqian.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09.]
- Hutcheon, Linda. *Irony's Edge: The Theory and Politics of Irony*. London: Routledge, 1994.
- Kieran, Matthew. "Forbidden Knowledge: The Challenge of Cognitive Immoralism." *Art and Morality*, edited by J. Bermudez and S. Gardner. London: Routledge, 2003. 56-73.
- 克尔凯郭尔：《论反讽概念：以苏格拉底为主线》，汤晨溪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
- [Kierkegaard. *The Concept of Irony, with Continual Reference to Socrates*, translated by Tang Chenxi.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2005.]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

[Nie Zhenzhao. *Introduction to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Beijing: Peking UP, 2014.]

——：“谈文学的伦理价值和教诲功能”，《文学评论》2（2014）：13-15。

[—.“On the Ethical Value and Teaching Function of Literature.” *Literary Review* 2 (2014): 13-15.]

O'Neill, Patrick. *The Comedy of Entropy: Humour, Narrative, Reading*. Toronto, Buffalo and London: U of Toronto P, 1990.

Pollard, Arthur. *Satire. The Critical Idiom*, edited by John D. Jump, London and New York: Methuen, 1970.

克劳德·罗森：《上帝、格列佛与种族灭绝：野蛮与欧洲想象：1492-1945》，王松林等译。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3年。

[Rawson, Claude. *God, Gulliver and the Genocide: Barbarism and the European Imagination, 1492-1945*, translated by Wang Songlin, et al.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13.]

——. *Gulliver and the Gentle Reader: Studies in Swift and our Time*. London: Humanities Press International, 1991.

——. *Swift's Angers*. Cambridge: Cambridge UP, 2014.

理查德·罗蒂：《偶然、反讽与团结》，徐文瑞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

[Rorty, Richard. *Contingency, Irony, and Solidarity*, translated by Xu Wenrui.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03.]

苏晖：“后伦理选择时代的科学选择”，《外国文学研究》6（2022）：37-51。

[Su Hui. “Scientific Selection in the Post-Ethical Selection Era.”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6 (2022): 37-51.]

Suarez, Michael, F. “Swift's Satire and Parody.”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Jonathan Swift*, edited by Christopher Fox. Cambridge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P, 2003. 112-127.